

# 东乡族农业发展史考述

## ——从以军营田到小农经济

刘江荣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东乡地区既是黄河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又是丝绸之路南道中转站。东乡族世代生活在河湟农业经济区与牧业经济区的边缘,以军营田是其历史上最主要的农业发展方式。清朝以降,东乡族土地占有权主体从戍边军队到由官僚、地主、富商和宗教上层人士联合构成的官僚地主阶级之演变催生了小农经济。商业反哺农业是东乡族在农牧业资源边缘带域存续小农经济之殊途。

[关键词]东乡族军屯;土地占有权;小农经济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8-0018-04

### 一、屯田强制东乡农业发展

屯田是千古之策。<sup>①</sup>历史上的屯田,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首先都是与军事目的或统治需要紧密相联系的国有制经济。军屯以军队作为屯田劳动者,国家以军律将士兵固着在土地上从事屯田生产。屯兵使用的土地、耕畜、农具、籽种等生产资料,都由国家提供,屯兵对这些生产资料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sup>②</sup>元代屯田的设置,也像前代一样,和当时的兵制和财经制度密切配合。但作为“民族”政策或移民措施的配合部分,发挥的作用更为特殊。在蒙古统治政权的手里,它被更充分地利用为一种掠夺土地、奴役人民和“民族”压迫的手段,具体表现在剥削方法更为有效而残酷,剥削面更为广泛而剥削程度更为深刻。<sup>③</sup>按民、军、匠诸色之划分,元代早已有之。明代在黄册里甲制度尚未建立之前,其户籍仍以元末原籍为据。<sup>④</sup>蒙元时期,是穆斯林移居中国最多之时。由于成吉思汗子孙三次西征,被签发东来的中亚和西亚穆斯林多达数十万人,他们主要是工匠和平民。工匠被编入元朝政府或诸王贵族所属的工局,从事纺织、建筑、武器、造纸、金玉器皿等各种行业的劳作,是中国回族先民最早的工人队伍。平民被编入探马赤军,充当蒙古军的前锋,后又派去镇戍边关要塞,既是战士,又是农民,过着兵农合一的生活。这是中国回族、东乡族等先民最早的农民队伍。<sup>⑤</sup>

元末,经过长期战争,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客观情况迫使朱元璋不得不通过军屯解决部分军队给养。朱元璋出身下层,了解民情,深知要取得农民的支持,决不能竭泽而渔。形势的需要、斗争的实践以及朱元璋个人的经

历,使他逐渐形成了兵农兼资、耕战结合的思想和政策。<sup>⑥</sup>明朝建立后,派征西将军邓愈攻占河州、循化、贵德等地,元朝的吐番等处宣慰使锁南普、镇西武靖王卜纳刺、西宁州同知李南哥以及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南木哥、吉保、失刺等相继降明,明王朝对他们加官赐爵,以资笼络,实现了河湟地区的安定。河湟地区东接秦陇、西通西域、南交蜀藏、北护甘凉的战略位置,加之复杂的民族组成,使其成为明王朝的重点经营地区之一。<sup>⑦</sup>明初河州卫有正军员额1万余名,屯军人口约6万人,分布在7个屯田千户所之68个屯寨。<sup>⑧</sup>按照朱元璋“陕西诸卫军留三分之一御城池,余皆屯田给食”的诏令,河州卫参与屯田的军人至少在7000人以上,若按每人50亩屯田计,可开垦屯田3500顷。据嘉靖《河州志》卷1《食货志》记载,嘉靖时河州共有屯田3452余顷,而此时河州民户的耕地也只有3559顷,有民户5208,口90845,可见,明初河州卫屯田在当地农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sup>⑨</sup>明清政权更迭后,在战乱造成的荒芜土地上,清朝政府实行了大规模的屯田,以至在政府文件和官员口语中,将甘肃的耕地统统叫作屯田。<sup>⑩</sup>由此可见,蒙元以降,军屯制主导包括东乡在内的河州农业之发展。

进而论之,军屯地点的选择在历史上主要有以下四个标准:一是腹里军事据点,二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要塞,三是水陆交通要枢,四是边防地区。<sup>⑪</sup>东乡地区符合军屯四个条件中的后三个条件,这就决定了寓兵于农的军屯一直是东乡最为主要的土地制度。当河湟边缘汉藏之间政治比较稳定,多民族矛盾得以缓和的历史时期,军屯往往转化为民屯;当中央王朝更迭战乱时,往往

造成这一少数民族山区边地大量土地荒芜。依从征官兵之留戍者、土著之归附者、有罪谪戍、调拨来边者四大军户来源看,东乡地区的军户在蒙元时期主要是中亚和西亚从征官兵之留戍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术界在对东乡族主体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零星研究中,长期忽视对东乡地区屯田制度的探讨。事实上,至鸦片战争以前,东乡地区的小农经济并不发达,鸦片战争后,仍有不少官地(屯田)。蒙元以降,在东乡农业生产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屯田制度中的军屯,大部分肥沃土地的所有权行使主体是军队而非地主、土官或流官。东乡地名信息中就遗存有历代中央王朝戍边屯田开发的历史痕迹。据马志勇先生考证:“东乡地区沿川沿原土地肥沃,水利条件便利,宜于屯田;山区水草丰盛适于放马。这些细节虽不见史册,但从东乡地区的地名可以得到证实。在黄河西岸的东乡喇嘛川有‘屯地’地名,东源公社有‘新屯地’地名,考勒公社锁豁土原也是蒙古人屯田的地方,这个原共有土地七千余垧,其中‘屯地’、‘民地’各占一半,这些‘屯地’、‘民地’的叫法一直沿用至今。东乡还有三处‘同前’,‘同前’就是‘屯田’,在东乡语中 qian 与 tian 对音。”<sup>⑬</sup>要一述,东乡地区河川良田多为历代中央政府以军队直接占有,为其军队补养服务,军事屯田才是历史上东乡族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推动力。

更进一步讲,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sup>⑭</sup>始自秦汉的边防军事屯田制度对现今东乡族的形成至为关键。一方面,这种制度在秦汉时期就将东乡地区土著先民河湟羌纳入其中,使其很大一部分完成汉化并有效发展了当时的生产力,从此拉开了河湟经济开发的历史大幕。另一方面,元朝对于包括东乡地区在内的河州之边防军事极为重视,影响直至明清,严格的屯田户籍制度又将构成现今东乡族主体的非土著先民长期固化在东乡地区。这一历史时期,屯田制度不仅大大加速了东乡族非土著先民本土化的进程,而且明朝在当时强制汉化少数民族。洪武五年(1372),“令蒙古、色目人氏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sup>⑮</sup>后又令各族人民都一体纳粮当差,这就进一步从经济生活上促进了东乡族与河湟地区其他民族相互融合。总之,军屯为主的历代屯田一方面强制性东乡族主体农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东乡族在供养补给元、明、清集权官僚政府军队和巩固加强中央王朝边防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一制度确立了农业在东乡族多元生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使得东乡族主体经济日趋自洽于大一统的统制经济体系。与此同时,东乡族为主体的农民阶级在元明以降的东乡登上了历史

舞台,在反抗满清王朝的数次艰苦斗争中逐渐显露出英勇团结的民族自觉性。

## 二、东乡土地占有主体更替

集权官僚制是以政治的集权控制土地所有权的专制。<sup>⑯</sup>这一制度在经济上实行以皇帝为名义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官吏有职田、禄田的占有权,并将部分土地占有权“均配”给农民,可以买卖、析分继承。无地或少地农民可向官僚地主租土地,成为佃农,付一定的地租,作为使用土地的代价。不论地主还是农民,都要向国家交税,以体现国家土地所有权对占有权的控制。<sup>⑰</sup>在中国集权官僚农民社会里,统治制度的新创设或较有效的传统制度的加强,主要是阶级矛盾的广泛化和尖锐化的表现。自辽金以后,军屯逐渐强化,元明两朝发展到高峰,是封建社会后期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具体反映,是在农民反封建斗争日益扩大和加剧的趋势下,封建国家为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所采取的措施。<sup>⑱</sup>复前述及,河湟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可西控塞外诸卫,北据蒙古,南捍诸番,东卫关陇,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重视。明初,随着河湟地区卫所的建立,为进一步控制刚降附的土官进而控制整个青海,明廷采取了不同于西南地区以土司统治为主、流官为辅的方式,而以流官为主、土官为辅,“土官与汉官参治,令之世守”<sup>⑲</sup>的措施。<sup>⑳</sup>明洪武以降,东乡地区的军屯制趋于衰微,“土流参治”的政治制度开始在东乡社会发挥主导性的统治作用;土地占有权行使主体以明洪武中期河州实行里甲制度为标志,从中央戍边屯田军队转变成成为土官与流官共同领导下的官僚地主阶级,东乡族沉重的赋役随之而来。有清一代,东乡族在土司制、里甲制和会社制的统治下遭受地主、官僚、宗教上层人士和高利贷者四位一体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

封建国家的统治须有它的物质基础——田赋和徭役。<sup>㉑</sup>对此,陈翰笙先生研究指出:“赋役制以小规模农业的自然经济为基础;联合着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在小经营中制造必要的及剩余的生产物。这种剩余生产物以物品田租的形式流入地主的掌握中。物租与力租不是没有合并的可能,但在赋役制下力租却限于极小部分。即使中国或印度的地主比较法国地主所领的土地面积要小得多,土地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间的生产关系还是丝毫不变的。印度与中国的地主在赋役制下同样是以物租的形式向农民榨取剩余生产物的。这种榨取方式同欧洲中古时代地主所用的完全没有什么差别。”<sup>㉒</sup>清政府对东乡人民最大的掠夺之一就是赋税,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以前,东乡赋税非常混乱,田亩没有定则,赋税没有定

量,由里长、甲首等任意勒索。康熙四十四年(1705),经过清丈土地、厘定税则以后,东乡人民每年仍要交纳千石左右的粮食,两三千两地丁银,再加上大量临时摊派,人民负担很重,因而使得大批东乡人民弃田逃亡。在地主和官府的双重掠夺下,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这具体表现在当时东乡人民与统治阶级的武装冲突上,特别是乾隆、同治年间的反清斗争,规模很大,斗争也很激烈。鸦片战争以后,东乡除了私有土地,尚有相当数量的官地,又叫屯田。屯田租额较轻,因此多为豪绅地主承包,他们又转租给佃户或雇人耕种,从中进行剥削。<sup>②②</sup>

诚如东乡花儿所唱:“百七百八地杂青稞,二百的斗价里过来了;交过了皇粮催团课(地租),穷汉们没活的路了。”<sup>②③</sup>相较军事屯田占主导的元明时期,清代东乡族的小农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小农经济不仅维持了农民这个主要劳动者阶级的简单再生产,也为官僚地主阶级的统治提供了经济条件。<sup>②④</sup>小农经济的发展是清代东乡地区集权官僚统治强化的突出表现;土地占有主体从戍边军队到由官僚、地主、富商和宗教上层人士联合构成的官僚地主阶级之演变,加深了东乡农民与统治集团之间的经济矛盾。总之,广大东乡族人民在清朝统治的200余年中常常食不充饥,衣不蔽体,东逃西散,苦不堪言,最终走上了武装反抗满清官僚地主阶级的革命道路。

### 三、东乡撒尔塔式小农经济

民族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社会形式,在长期对人们经济活动的制约中,逐渐地演变为经济的一种属性,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sup>②⑤</sup>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内部的坚固性结构;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sup>②⑥</sup>农民是中国古代文明主体的主要部分,其生产方式就是小农经济,即世代在自家占有或租来的小块土地上,以“家”为单位,进行手工劳动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他们的剩余劳动产品为官僚地主阶级所占有,是官僚地主经济得以存在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农经济和官僚地主经济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两种形式。<sup>②⑦</sup>东乡族土著先民的小农经济始于秦汉,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边缘带域的东乡地区不仅是农业与牧业生计的资源边界,而且是历史上多种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和河湟多元文化交融之区。明清以降,东乡地区既不是中国政治统治与经济发展的重心,也不是西北经济区内的开发要地。在这样的自然、人文与政经环境中,伊斯兰教信仰化作东乡族非土著先民的撒尔塔认同,进而创造出极具本民族特色的小农经济,本文将之称为撒尔塔式小农经济。

生活在集权官僚制中的东乡族虽始终坚持以农为本,但清朝以降,其农业生产自然条件每况愈下,农业生产和工具非常落后,农业生产自给却不能自足的矛盾较为突出。自然环境方面,据位于东乡县唐汪川的红塔寺石碑记载,康熙三十八年(1699)“山势岵峩,林木蓊郁”。清中期后,连年战争,兵燹不断,东乡地区林木被破坏几尽。<sup>②⑧</sup>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普遍是浅耕粗播,甚至甜种(即不施任何肥料)。光绪年间,农业生产工具有杠子、犁头、耩车、镢头、铁锹、石磨、石碾等,铁质工具很少。由于土地收获量极低,剥削惨重,广大农民除了交纳租赋外,所剩无几,连“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也达不到。因此,农民们多在农闲时外出当小贩、挑担子、当脚户,以弥补生活的不足。<sup>②⑨</sup>另外,由于农业生计资源的先天不足,东乡族土著先民和非土著先民千百年来许多生活日常用品的原料都与畜牧业有关。至今东乡的许多地名仍保留着当年畜牧业生产的痕迹。如“郭尼匡”意为羊沟,还有马场、牛沟等名。<sup>③①</sup>有鉴于此,撒尔塔式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集中表现为农牧相结合,长途贩运与短途贩卖相结合,家庭手工业、山地畜牧业和穆斯林商业因集权官僚统治而聚合植根于小农生产方式,以多元生业格局和多种生计手段艰难地存续着家庭经济。其中,贩运是东乡族突破小农经济桎梏,充分利用农牧两大经济区剩余劳动产品比较优势,进而以商品交换中间人和承运人的双重身份获得商业利润的最具本民族特色的移动性生计手段。挑担子、当脚户、制皮筏都是为了贩运,贩运一般会带来双重收入:第一重收入是提供运输服务的劳动所得,第二重收入是售卖所贩运商品的利润。在东乡族的经济生活中,这一移动性生计手段所得的双重收入大都用于存续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自给却不能自足的小农经济,因而贩运在历史上长期从属于小农经济,其双重收入终未积累形成商业资本。要而言之,商业反哺农业是撒尔塔式小农经济最大的特色。

总之,家庭经济是农民生存之本。<sup>③②</sup>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农业集约化与经济收益的递减是小农家族经济结构的特征。<sup>③③</sup>农民家庭既是一个消费单位,又是一个生产单位。农民的消费就包括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生活消费支出高于生产消费支出,是封建社会农民消费的又一个重要特点。<sup>③④</sup>以农为本的东乡族家庭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一面,又有商品性生产的一面。其中,农业属于自给性生产,畜牧业和手工业劳动剩余产品则常用于交换生活必需品,商业是东乡族一种移动性的生计手段,其主要内涵是充当商品运输的承运人和商品交易的中间人,其获利主因是



提供服务性的劳动。伊斯兰教文化的商业精神深入东乡族的骨髓,他们寓教于商,经商哺农,农牧兼营,以灵活多元的生业结构驾驭着农牧业生计的资源边界,以自治于小农生产方式的家庭经济不断强化着撒尔塔认同为

核心的社会记忆,以中国特色伊斯兰教门宦制度为纽带,在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绵延传承着本民族的经济与文化。

#### [注 释]

- ①赵予征:《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 ②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 ③梁方仲:《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82页、第365页。
- ⑤马通:《中国伊斯兰教门宦与西北穆斯林》,《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第117~131页。
- ⑥唐景绅:《明初军屯的发展及其制度的演变》,《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第33~45页。
- ⑦朱普选:《明清河湟地区城镇的形成与发展》,《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第59~68页。
- ⑧清·王全臣:《河州志》卷2《田赋》。
- ⑨武沐:《甘肃通史》(明、清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 ⑩李清凌:《甘肃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 ⑪王毓铨:《王毓铨史论集》(下),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45页。
- ⑫马志勇:《“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第31~48页。
- ⑬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 ⑭《明会典》卷20《户口》二《婚姻》一。
- ⑮刘永佶:《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 ⑯⑰刘永佶:《经济文化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第294页。
- ⑱⑲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23页。
- ⑳《明史》卷330《西域二》。
- ㉑张维光:《明代河湟地区“土流参治”浅述》,《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第108~114页。
- ㉒陈翰笙:《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农村经济参考资料之一,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第4页。
- ㉓㉔《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甘肃省编写组:《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72~73页。
- ㉕㉖《东乡族简史》编写组、修订本编写组:《东乡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第48页。
- ㉗刘永佶:《农民权利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 ㉘刘永佶:《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
- ㉙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2~373页。
- ㉚陈其斌:《东乡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 ㉛杨思远:《中国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 ㉜萧国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独特的“食货”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 ㉝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2页。

## 《大道——陕西交通跨越发展纪实》报告文学集首发

日前,一部全景式、多角度地反映陕西交通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十一五”以来交通加快发展沧桑巨变的精美图书,《大道——陕西交通跨越发展纪实》报告文学集首发式在西安隆重举行。

作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之作,《大道——陕西交通跨越发展纪实》从策划到筹备直至成书,由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宣教中心组织,陕西省交通作家协会具体承担编辑统筹工作,分工负责,全力以赴,邀请省内有一定知名度、熟悉陕西交通建设、创作激情高、出手

快的莫伸、冯积岐、和谷、商子秦、朱文杰和常智奇六位著名作家,分章节采访、撰写,并成立了编委会和编辑统筹组。本书由序言《感谢这个时代》、《高速篇 九衢若飞虹》、《干线篇 纵横新天地》、《村路篇 阡陌的嬗变》、《改革篇 辉煌三大步》、《运输篇 流畅的血脉》、《文化篇 绚丽助推器》和后记八个部分组成。作家们将笔触伸向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十一五”以来陕西交通的发展变化。全书20余万字,全彩色,文图并茂,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